

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重现与传承^{*}

吴杰伟 史家兴

摘要：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太平洋贸易网络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地理场域。本文在梳理学界对太平洋丝绸之路中跨文化交流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外档案文献的比较作为主要研究视角，通过《古今形胜之图》的传播过程与影响，以及中国清朝政府和暹罗政府对朝贡事件的不同记述两个跨文化交流案例，观察不同语境下档案对比的研究价值，分析不同档案表述中的跨文化参与心态，阐述海上贸易活动与跨文化交流的相互推动关系，思考通过档案文献的可视化形式重现跨文化交流的路径。

关键词：太平洋丝绸之路 中外档案 文本比较 知识传承 跨语境

海洋贸易档案与跨文化交流

太平洋丝绸之路包括了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参与太平洋不同地区的贸易活动。在16世纪之后，随着跨太平洋贸易航线的开辟，在环太平洋和跨太平洋的航线上逐渐建立了一个纵横交错、多地联动的贸易网络，为文化交流、人员往来和知识传播构筑了广阔的地理场域。在跨洋贸易的带动下，世界各地的人员和货物都迎来了大规模的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LSYZD2101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吴杰伟，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史家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流动，进而带动了文化的跨地区、跨语境传播。梳理航海图、海关记录、政府文书等领域的历史档案文献，研究跨文化交流的多语种一手档案文献，对深入呈现太平洋地区文化交流案例细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思考跨文化交流渗透到太平洋各个角落的发展过程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原始中外文档案资料保存比较完整，为研究太平洋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关系从发生、发展到转型的整个过程提供了具体而翔实的研究资料。这些档案文献资料既包括国内学界运用较多的中国古籍资料、翻译成中文的丝绸之路文献、英文档案资料，也包括国内学界关注较少的西方语言（如荷兰语、西班牙语等）和周边国家语言（如泰语、日语等）的原文档案文献。这些档案记载既包括中外学者、官员和商人留下的大量记述，也包括参与贸易与文化交流活动的各国政府留下的大量原始记录和图片。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文化传播活动中，文化传播的途径相对较少，主要呈现从中心向四周传播和线性的传播形式，传播的速度也比较慢，传播到范围相对较小。随着全球海上航线的开辟，文化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和路径更加多样，以各个主要海上贸易港口为中心和节点，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海上贸易网络，跨文化交流呈现网络状形式，文化交流起点和终点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各种文化形态呈现活跃的传播状态。通过海洋贸易的多样性和便利性，文化传播的效率得到提高，并依托着海洋贸易中大量人员和货物长期交流的支撑，跨文化交流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的范围也更广。不同地区了解、消费异文化的需求和冲动更加强烈，各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借助跨洋贸易的途径，单向、双向和多向传播到世界各地。通过海洋贸易网络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活动和影响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在物质交流的基础上，开始挖掘文化交流的内涵和底蕴，甚至出现只在海洋贸易网络传播的文化内容（如保佑海上航行安全相关信仰的传播），充分体现跨地区民众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于物质

世界的美好想象等，构筑了一个多层级、可循环的文化传播和接受系统。^①符合对象国民众偏好的文化符号、能够引起受众共鸣的文化内容具有更好的文化渗透性，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而在这点上，贸易商人在商业上的敏感性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品的选择以及文化交流的深入。

太平洋地区是跨文化交流非常活跃的地区，太平洋贸易网络不仅传递丰富多彩的货物，也传播着形态多样的文化形式。中国与太平洋周边地区的贸易活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了海上丝绸之路更加广阔的空间范围和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分散，甚至彼此孤立、隔离的环太平洋地区逐步形成日益紧密的贸易网络，注入了政治的、文化的内容。^②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挖掘太平洋丝绸之路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通过中外档案文献的比较研究对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交流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阐释历史上跨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

学界对跨洋文化交流的研究与思考

中国学界对海上贸易中文化交流的研究，以西向为主，聚焦印度洋和欧洲地区，通过货物的流转串联起中国与印度、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欧洲之间的广阔地区，并在印度洋地区形成了环绕整个大洋的交流途径。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依靠古籍中的相关记载，对于重要的航海信息（如航线、海图等）的记录相对较少，甚至一些重大海洋航行事件的档案，如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记录、宝船的建造图样等，都没能保存下来，再加上明清时期海禁政策的影响，很多海上贸易以“走私贸易”“私人贸易”的形成存在，在档案资料中更是无法直接找到相关的信息，从而给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① 侯怡：《中国网络文学改编的电视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1页。

^② 何芳川：《太平洋贸易网与中国》，《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第64—73、127—128页。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太平洋西岸的交流频密而深入，但形成跨太平洋和环太平洋丝绸之路的时间相对较晚，学界的关注相对较少。16世纪以后，随着全球海上连接的实现，太平洋海上贸易从传统的近海贸易逐步过渡到跨太平洋和环太平洋贸易的形式，呈现出比印度洋贸易更加深厚的历史影响。

中国学界主要从历史视角对太平洋丝绸之路的研究进行了探索，呈现一个逐步丰富和扩展的过程，涉及全球史、地区史、贸易史、农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界聚焦全球各地的民族独立和反殖民运动，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也作为研究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学界的研究视角^①。80年代，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和研究潮流的兴起^②，学界也开始探讨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革和文化特点，特别是中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建交之后，中国与美洲交流历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对于跨太平洋航线和贸易历史的关注空前高涨，中国—墨西哥—西班牙贸易研究模式扩展了太平洋丝绸之路范围和影响^③。90年代，通过对海外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通过太平洋贸易网的研究将太平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和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全局和全貌。^④

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⑤是国内研究海上丝绸之路

① 李永锡：《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早期的大帆船贸易》，《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3期，第75—97页。

② 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161—177页。

③ 张铠：《明清时代中国丝绸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第63—72页；沙丁、杨典求：《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演变》，《历史教学》1983年第7期，第27—31页；刘文龙：《马尼拉帆船贸易——太平洋丝绸之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第104—108页。

④ 王苍柏：《太平洋时代的历史定位——从太平洋贸易网谈起》，《东南亚研究》1997年第3期，第35—38页；何芳川：《太平洋贸易网与中国》，《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第64—73页、第127—128页；李毓中、许壬馨：《马尼拉大帆船：远东与美洲贸易史研究》，《东南亚区域研究通讯》1999年第9期，第112—118页。

⑤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路的重要参考文献。该书论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历史，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向外传播丝绸、瓷器等商品的“经济贸易之路”，传播各国人民友谊的“友好往来之路”，传播各族人民光辉灿烂文化的“文化交流之路”，传播我国四大发明、科学技术交流的“造福人类之路”，而且也是振兴中华、促进我国当前对外开放和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①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视角比较明清时期东南沿海人民移居台湾与菲律宾的异同，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方真真翻译的《华人与吕宋贸易（1657—1687）：史料分析与译注》^②对1657年至1687年间华人赴吕宋贸易的西班牙史料进行了整理与解读，书中附有这一时期的《马尼拉政府官员表》《中国赴吕宋船只资料表》《中国赴吕宋船只入港日期与船舶数量表》《从吕宋开往或返回中国的船只资料表》《中国赴吕宋各船只贸易额估算表》等，对于理解当时华人与吕宋的贸易网络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陈博翼的《限隔山海：16—17世纪南海东北隅海陆秩序》^③将研究视点置于南海东北隅，透过这一案例指出区域本身即有自己的秩序，因殖民扩张、王朝易代等外界变量而演化出新的自在性秩序。

《海交史研究》创刊于1978年，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与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立足古代泉州近海优势，借助现存丰富的典籍文献和历史遗迹，重现泉州在海外交流中的重要枢纽地位。主要刊登内容涉及航海史、造船史、港口贸易史、中外关系史、科技文化交流史、海交民俗、海交文献、外销陶瓷研究等。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83年开始推行中国海洋发展史

① 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

② 方真真：《华人与吕宋贸易（1657—1687）：史料分析与译注》，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③ 陈博翼：《限隔山海：16—17世纪南海东北隅海陆秩序》，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

研究计划，主编出版的《中国海洋发展史》自1984年至2008年共刊行10辑11册，收录了多篇关于太平洋丝绸之路的论著，如李毓中的《〈印地亚法典〉中的生人：试论西班牙统治菲律宾初期有关华人的法律规范》（2002）、李毓中和季铁生的《图像与历史：西班牙古地图与古画呈现的菲律宾华人生活（1571—1800）》（2005）等文，为研究外国古籍及图像中的华人社会生活提供了优秀范例。2014年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联合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等机构，成立《季风亚洲研究》期刊，形成了一系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具有借鉴意义。陈宗仁在《十六世纪末 Boxer Codex 有关 Xaque（畜客）的描绘及其时代背景》^①一文中，摘取《谋区查抄本》手稿中的“Xaque（畜客）”图像及说明文字，结合《皇清职贡图》等文献和近代学者调查报告，对畜客服饰、名称及不纳税的叙事进行溯源研究。^②

作为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参与者，西班牙、墨西哥、美国等国家在大航海贸易方面的档案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坚实支撑。成书于16世纪末的《谋区查抄本》（Boxer Codex）（原稿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Lilly图书馆）由22个长短不一的篇章组成，记录了早期西班牙人对于接触到的亚洲各不同族群的印象，内有97幅栩栩如生的手绘彩色插图，描绘了菲律宾、爪哇、文莱、日本、暹罗、中国等地的人、鸟类、鱼类以及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魔形象。美国学者乔治·苏萨（George Bryan Souza）和杰弗里·特利（Jeffrey S. Turley）等人历时多年，完成了对原手稿的现代西班牙语转写和英译，2016年出版了《谋区查抄本：16世纪晚期太平洋、东南亚和东亚地理、民族学和历史的西班牙抄本与翻译》（*The Boxer Codex: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n Illustrated Late Sixteenth-Century Spanish Manuscript Concerning the Geography,*

^① 陈宗仁：《十六世纪末 Boxer Codex 有关 Xaque（畜客）的描绘及其时代背景》，《季风亚洲研究》2016年第3期，第33—65页。

^② 于施洋：《“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开题报告》，2021年；谢侃侃：《“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开题报告》，2021年。

Ethn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Pacific,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 Leiden: Brill, 2016), 书中增加了词汇表、地图、参考书目及索引, 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彼得·博施博格 (Peter Borschberg) 和罗潘贾利·罗伊 (Roopanjali Roy) 编译出版《雅克·德·库特关于 16—17 世纪东南亚安全、贸易和社会的回忆录和文集》(*The Memoirs and Memorials of Jacques de Coutre: Security, Trade and Society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15) 记录了珠宝商人和冒险家雅克·德·库特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在暹罗、菲律宾、马来群岛等地旅行途中的传奇见闻, 书中有 62 幅地图和手绘图画。该书还收录了雅克·德·库特一些未发表的珍贵手稿, 对于研究早期东南亚社会及其与殖民国家的交流碰撞有非常独到的价值。吴义雄从 2014 年开始系统购入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大英图书馆广东十三行中文书信、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等, 以及美国庇博地·埃塞克斯博物馆等机构珍贵档案, 包括纸质、电子档案、缩微胶卷及复制重要的外销画藏品, 编著或翻译出版《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 世纪 30 年代中英关系研究》^①《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 1784—1844》^② 等就广州口岸的茶叶贸易、外销艺术品图像与雕像研究、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美关系、广东十三行行商与士人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讨论。^③

档案的流转与跨文化知识交流

档案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记录, 是留存社会记忆、传承历史

^①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 19 世纪 30 年代中英关系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年。

^② [美] 雅克·当斯:《黄金圈住地: 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 1784—1844》, 周湘、江滢河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③ 谢侃侃:《“‘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开题报告》; 于施洋:《“‘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开题报告》。

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群体的独特记忆，是唤起人们对历史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载体。档案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交流过程成为全人类记忆的珍贵组成部分，能够唤醒跨文化语境民众对文化的相互认同，是推动跨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也是构建中外人文交流体系的有力支撑。^①跨文化交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长时段的交流活动中选取具有典型性的跨文化交流的档案，可以全面地挖掘文化交流个案的历史价值，也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呈现跨文化交流的不同理解与记忆。

通过对档案文献的梳理，可以重现中外跨文化交流的路径形成与内容变化，也可以呈现中国对海洋的认识和理解。在中国的历史地理文献中出现了“东洋”“西洋”“小东洋”“小西洋”“太平海”“大东洋”等海域名称，这些中国文献中关于“太平洋”这个海洋区域的认识，就是在不断的海洋贸易和跨文化交流逐渐形成的。中国对周边海域的认识，以及对太平洋地理知识的认识，是中国商人长期海洋航行知识积累的结果，也是中国与西方文化长期交流的结果。“西洋”的名称初见于五代时期，五代时的“西洋”和宋元时代“小西洋”所指的范围大体接近，主要指马六甲海峡两边的马来半岛和印尼苏门答腊周围地区，宋元时代的“西洋”主要指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八儿国及其周边地区。随着宋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造船技术和海上航行知识的发展，基于海上贸易航向的差异，中国商人对中国周边海域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和明确，并在不同时代的档案文献中留下了诸多记录，勾勒出中国民众对周边海域的想象和图景。“东洋”的概念初见于元代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分为“大东洋”和“小东洋”。元初和元中期的“东洋”主要指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其中“小东洋”主要指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而“大东洋”

^① 王玉珏、许佳欣：《档案馆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认同功能及其实现》，《档案学通讯》2020年第3期，第53—59页。

主要指加里曼丹岛以南直至澳洲之海域。^①元代以后“东洋”与“西洋”的概念继续为民众广泛采用。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中只有“东洋”和“西洋”的总名称，不再有“大东洋”与“小东洋”“西洋”“大西洋”之分。但张燮的“东洋”，大体上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东洋”，“西洋”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西洋”的概念。海船出洋前往东南亚地区通常取两条航线：一是从福建、广东大体沿东亚大陆海岸南下，以大陆沿海的地形为标志物导航，所经海外诸地皆称为“西洋”，海上航线被“大陆航线”。过“小西洋”后，再向西便是印度，这里在宋元时代被称为“西洋”。另一条航线是先横渡台湾海峡至琉球群岛，或先横渡南海北部至吕宋诸岛；然后再沿菲律宾岛南下，以西太平洋岛弧南部诸岛为导航的标志物，所经诸地皆称为“东洋”，海上航线被称为“岛屿航线”。^②进入大航海时代后，中国海商在与西方殖民者贸易的过程中，吸收融汇西方世界对海洋的探索和理解，并将其运用到中国的海洋命名体系中。清末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中多处提到“大东洋”，如“檀香山为大东洋之岛国，地广人稀，华人趋之者众，土人忌之”^③。对于太平洋地理的认识和表述，体现了跨文化的知识传播，也是跨文化交流在空间上的扩展。地理称谓在不断的变化中，逐渐建立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传承和传播的桥梁。

对于跨文化交流，不仅可以以文字的方式描述或记录过去的事件，而且可以以形象化、图像化的方式呈现在文化的记忆中。在太平洋的海上航行中，通过绘制地图、海图，海员和军官的海上航行，就是对过往航线的重演，也是在不断的记忆重复中进行知识的传承与

① 贺威：《宋元福建科技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9页。

② [清]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清光绪二十年（1894）；刘迎胜：《中国古代图籍中的亚洲海域》，《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0年第1期，第1—38页；王胜三主编：《“一带一路”百问百答》，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第177页。

③ [清]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

传播。^①《古今形胜之图》(Ku Chin Hsing Sheng Chih Tu)为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喻时(也有学者认为是甘宫)^②于嘉靖十九年(1540)在江西省信丰县北官编集首印,依据是《明一统志》,目的是“欲便于学者览史,易知天下形胜古今要害之地”。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闽南林希元重新刊刻,其中金沙书院版本流往海外。金沙书院所在的具体位置,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③,不过普遍认为在明代重要对外贸易、中菲贸易港口——月港的周围。《古今形胜之图》随着闽南海商的贸易活动,流传到菲律宾地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第二任总督基多·拉维查理士(Guido de Lavezaris)在马尼拉任职期间(1572—1575)得到了这幅《古今形胜之图》。他于1574年7月30日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说他随信呈上一幅中国地图刻本,并安排在菲律宾的修道士和华人(可能是林碧秀和陈慧敏)^④共同将图中的重要地名和说明文字译成西文。^⑤这幅地图在1575年8月15日到达马德里,是传到欧洲的第一份中国地图。^⑥《古今形胜之图》现收藏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市(Sevilla)的西印度总档案馆。地图辗转漂泊的经历,反映了十六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中西地图交流的缩影,地图的顶端和中部所注的西班

① Geoff Quilley, “Reenacting Cook’s Voyages in Nineteenth-Century Visual Culture”,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Vol.56, No.4 (2016), pp.845–869.

② 金国平:《关于西班牙藏〈古今形胜之图〉作者的新认识》,《澳门学:探赜与汇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7—70页。

③ 任金城:《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文献》1983年第3期,第213—221页;徐晓望:《林希元、喻时及金沙书院〈古今形胜之图〉的刊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75—80页。

④ Fabio Yu-chung Lee, “‘Making’ China: Rearearch on the Ming Dynasty Ku Chin Hsing Sheng Chih Tu Obtained by the Spanish in 1574”, in Lee, Fabio Yu-chung,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ed., *Studies on the Map: Ku Chin Hsing Sheng Chih Tu*, 2017, pp. 27–45; Maria Antonia Colomar Albajar, “Ku Chin Hsing Sheng Chih Tu: A Map of China in 16th Century Europe”, in Lee, Fabio Yu-chung,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ed., *Studies on the Map: Ku Chin Hsing Sheng Chih Tu*, 2017, pp. 46–57.

⑤ 彭珊珊:《西方现存最早的中国地图440年后现身航海博物馆》,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6790, 2015年。

⑥ 徐晓望:《林希元、喻时及金沙书院〈古今形胜之图〉的刊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75—80页。

牙文字更是留下了浓厚的跨文化交流的痕迹^①，也促进了欧洲对中国认识与理解。《古今形胜之图》的制图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进行内容的扩展，形成了“形胜”系列地图，并随着跨文化交流的进行不断地增加和丰富文化交流的载体和内容，不仅是中国自身理解与看法，也加上了传教士带来的关于世界形势和海洋位置的知识^②，共同构建中西文化系统对海洋和世界的理解和认识。

中外档案呈现的跨文化交流心态

通过观察历史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可以观察档案如何在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中发挥作用，将这些聚集了众多档案的地点视为跨文化交流的中心，可以超越国家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关注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变迁。^③作为海上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太平洋丝绸之路包括以大帆船贸易为代表的跨太平洋贸易，也包括太平洋沿岸的贸易；既包括东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包括东方国家与殖民政府之间的贸易，从而建立在世界贸易史的独特地位。太平洋贸易活动除了中文资料，还保留了大量的外文档案资料，通过中外文档案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加充分地呈现太平洋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形式与影响。对外文档案文献进行深入梳理，提取档案文献中体现中外文化交流成就、中外文明互鉴、古代海上航线、中国货物和移民历史、物种交流等领域的典型案例，将中外档案文献进行对比研究，从中外文献两个角度呈现历史事件的多元面貌。通过对档案的具体细节和文

① 国图空间：《古今形胜之图》，http://www.nlc.cn/newgtkj/tssc/mzyj/201703/t20170307_142369.htm，2017年。

② 成一农：《“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研究——从知识史角度的解读》，《形象史学》2020年第1期，第256—284页。

③ Marieke Bloembergen, Martijn Eickhoff, “Exchange and the Protection of Java’s Antiquities: A Transnational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Heritage in Colonial Jav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2, No.4 (2013), pp.893–916.

本表达，观察档案文献资源之间的关联性，可以从更多角度理解跨文化交流的不同参与心态。^①

乾隆四十九年（1784），暹罗国王拉玛一世遣使进贡，在两国的档案记载中留下了不同的记录。泰文金叶表文（即国书）^②原件现在已经佚失了，其内容保留在暹罗皇宫手抄本中，现存于泰国艺术厅。泰文原文翻译如下：

阿瑜陀耶君主初登大宝，念及与大清大皇帝故有之邦交，特差帕史滑里为正贡使、朗喝汶悉呢霞为副贡使、朗拔察那丕汶为三贡使、坤帕塔纳丕集为大通事、汶丕匹湾遮为办事，向大清大皇帝进具表文。

泰文表文内容仅有一句话，传达了三个信息，首先是向大清皇帝表达问候，之后说明所遣使臣的信息，最后罗列向清朝政府进贡的物品。从暹罗表文中可以看出，暹罗国王拉玛一世意在与中国修好长久以来的邦交，故遣贡使进贡。表文中明确称清朝皇帝为“大皇帝”，使用了“进贡”的音译词，代表暹罗国王希望通过取悦清朝皇帝的表达方式，兼顾贸易需求和朝贡外交。^③

清朝政府将暹罗的表文表述如下：

暹罗国长郑华叩首叩首，上贡大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伏以皇恩浩荡，泽及遐荒；圣德宏敷，光临海隅。念故父任政暹罗，遣使朝贡，业蒙容纳，不胜荣幸。何期更邀隆遇，格外加恩，

^① 赵彦昌主编：《大数据时代档案工作实践与创新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② 李光涛：《记清代的暹罗国表文》，“中研院”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1959年，第511—556页。

^③ [泰]吴汉泉：《朝贡与利润：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王杨红、刘俊涛、吕俊昌译，王杨红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69页。

怀远属国，无微不照，使华感激无地，外报无门。兹华继嗣父业，当续父志。供奉贡典，不敢少忍；聿修厥职，永效忠诚。但华僻处海隅，遐荒粗定，今备方物来朝，贡礼诚难合式。俯思鸿慈，鉴华悃诚，必沾涵育。兹虔备金叶表文。

中国政府对文书的表达方式有一套严格的形式，在汉语关于暹罗进贡的表文翻译中，加入了大量清朝政府对朝贡行为的自我理解。例如清朝政府认为拉玛一世还未接受册封，所以称其为国长，而不是国王。表文中暹罗自称“遐荒”“海隅”“属国”，称乾隆皇帝皇恩浩荡（“加恩”），在行文中加入“继嗣父业，当续父志”“永效忠诚”等带有“请封”的意思。^①这些都是泰文表文中没有的表述和意思。

在中文和泰文表文的内容方面，泰语表文中没有涉及请封、谢封等信息，在汉字表文中都有相关的表达。在暹罗提交的表文中，“进贡”用的是中文借词的音译chimkong，而暹罗附属城邦进贡，如泰国南邦府向暹罗国王进贡，文件中用的是泰语动词thawai（进献），表文中“贡品”用了khreang ratcha bannakan，意思是皇家物品和贡品。也就是说，暹罗政府认为周围属国来“朝贡”才带有“宗属关系”，而暹罗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只是中文体系中的朝贡关系，在泰语体系中，并没有朝贡的表述或意味。朝贡文书属于上行文书，面对的阅读对象是皇帝，需要符合清朝政府朝贡的话语体系，但这种话语体系加入了很多适合清朝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述。暹罗政府也知道，只有通过朝贡，才能在得到清朝政府官方层面认可之后进行贸易，所以暹罗便迁就清朝政府，在原文中加入“进贡”的形式要素。朝贡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进行商业交易，这是私人船舶绝对不能享有的特权，在这种情况

^① 李光涛：《记清代的暹罗国表文》，“中研院”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1959年，第511—556页。

下，所谓的“贡”，最初曾作为首要动机，已让位给对“市”的考虑。^①从文书翻译的流程来看（朝贡文书生成过程包括审查、翻译；礼部接受；内阁翻译、票拟；进呈皇帝；皇帝批阅；执行；存档等步骤），泰语表文至少要经过两次翻译，才能呈到皇帝面前。在翻译过程中，不管是地方上的督抚还是内阁，都对文书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润色，采取译者向读者靠拢的翻译策略^②，使其成为符合朝贡话语体系的官方文书，满足清朝政府心态。^③如果不按照清朝政府的要求，这些文书甚至都不能呈到京城，贸易活动也无法开展。暹罗承认自己进行的是朝贡活动，并围绕着朝贡活动衍生出“请贡”“探贡”“补贡”等活动，以便开展更多的贸易活动。这些关于朝贡的程序是清朝政府为了体现朝贡的严肃性而设立的，而对暹罗政府而言，则是通过各种“朝贡”外衣下的官方交流活动，获得贸易上的收益。^④通过中外官方档案的对照可以看出，中国与暹罗之间关于朝贡文书的表述有很大差别，清朝政府文书明显反映出的是宗主国和朝贡国之间的关系，而暹罗文书，虽然表述了“进贡”的态度，也只是提到修好邦交，反映出的是一种较为平等的地位。

中国和暹罗之间的官方往来和贸易关系，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商品在太平洋贸易网中流通的途径之一。可以通过研究太平洋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交流，研究文化从传播到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可以挖掘出不同文化交流主体之间的态度，体现出非常典型的跨语境文化交流中“我者”和“他者”之间心态上的转变。

① [泰]沙拉信·维拉福尔：《清初海禁期间的中暹朝贡贸易》，颜章炮译，《南洋资料译丛》1990年第4期，第94—101页。

② 华先发、胡孝申：《翻译与文化研究》，武汉：长江出版社，2007年，第10—12页。

③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1—8页、第96页。

④ [泰]沙拉信·维拉福尔：《清初海禁期间的中暹朝贡贸易》，颜章炮译，《南洋资料译丛》1990年第4期，第94—101页。

结语：外文档案是跨文化研究的延展

档案文献是社会记忆的内容构成和社会发展的见证，对其文化元素的挖掘与对比，有利于增强对文化交流的理解。^①太平洋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重要通道，更是通过连接太平洋各个地区港口，进而连接世界的重要渠道。太平洋东西两岸的货物、环太平洋的人员流动、全世界的知识，都在贸易的航线上和贸易的活动中充分交流融合。中国的商人为了更加贴合不同的需要，特别是作为主要消费者的欧洲人的偏好，需要深入了解和掌握欧洲的文化形式。在殖民体系支持下的西方商人为掌控贸易点及其人员的基本情况，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货物流通、人员交往、信息收集和传播网络，详细记录贸易据点行政长官及委员会的决议、日常事务、区域勘测、财务状况、货物状况等，涉及太平洋当地的社会关系、权力更迭、战争冲突、外交关系等，还包括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态。挖掘外文档案资料的跨文化交流现象，并与中国的档案文献记载相结合，将为海洋文化交流提供丰富的研究视角和空间，为中国将海洋贸易的影响扩展到太平洋的东岸地区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使海上丝绸之路的格局和视野都更加广阔。

太平洋丝绸之路推动了太平洋地区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辐射太平洋沿岸各个地区，延伸到太平洋以外的地区。长时段的贸易活动通过知识传承和跨文化交流，带来知识的再生产，进一步带来跨文化交流的深入，促进不同领域的知识不断结合，在太平洋地区绘制出了一幅跨文化交流的繁盛图景。

^① 王玉珏、许佳欣：《档案馆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认同功能及其实现》，《档案学通讯》2020年第3期，第53—59页。